



全面深化改革对话 / 2018 年第 12 期 (总第 45 期)

- 对话嘉宾: 刘金山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策划/主持: 文丰安 改革杂志社副总编辑、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内容提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化与国家战略互动的引领性平台, 是未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全球治理的空间载体和经济增长极群落。以智能制造全球生产权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粤港澳大湾区要率先而为。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需要湾区内部各地区产业链有效连接。全球化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全球化“融智”和全球化“融资”, 通过全球化“融智”实现全球化“融资”, 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集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重点要探索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等条件下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进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大湾区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

Abstrac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leading platform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y, and a space carrier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 community of economic growth poles with decisive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a new open economy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global production right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eds the industrial chain links of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the Bay reg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eds to be “intellectualized” and “financed” globally. Through “intellectualized” globalization, the “financed” globally can be realized and the high-end elements of the world can be attracted to gathe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ree independent tariff zones”,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how to realiz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of Greater Bay Area,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2017年3月,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 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7月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明确了粤港澳合作的宗旨、目标、原则、重点领域、体制机制安排。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要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的互利合作。2018年8月15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要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湾区内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推动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期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为主题,由改革杂志社副总编辑文丰安教授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教授,就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产业载体、建设路径、制度保障等展开深度对话。

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引领全球价值链

文丰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试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开放领域至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再到沿江、沿边、内陆省会城市的开放,逐步形成了全范围、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加深,我国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现阶段,正在朝着引领价值链的方向迈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刘金山:我同意您的判断。全球化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互动,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前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由小到大、由大变强,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即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和地区价值链,再到引领全球价值链。每一次世界制造中心的变迁,必然有一个强国的出现,世界工厂以其强大的生产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推动着该经济体快速成长。即使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而发生产业转移之后,该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依然存在。伴随着产业转移,强国进行了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布局。美国、日本的经验是:产业转移后,通过产业链连接,构建全球价值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试点开放,到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而构建国家价值链,未来将引领全球价值链。从构建国家价值链迈向引领全球价值链,从全球化追随者转变成全球化引领者,需要具备全球化产业引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试点开放,到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而构建国家价值链,未来将引领全球价值链。

能力和价值链管理能力。其背后就是谋求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全球分布。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GNP体现了一个经济体的居民基于全球分布的财富创造能力。谋求GNP的全球分布,是一个大国变为强国的具体体现。

文丰安:引领全球价值链,需要区域率先突围。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刘金山: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有率先突围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5万平方公里,沿海拥有天然深水港7个,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达6956.93万,GDP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集群,是亚太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珠三角九市是内地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是世界上多种产品的主要制造地,广州、深圳具有创新研发和运营总部优势,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具有高端制造、协作配套优势;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则具有科技创新和服务创新优势。

引领全球价值链,需要区域率先突围。

文丰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刘金山:2017年7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提出要推动大湾区内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作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升级版。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强大的集聚和外向功能,具有发达的国际网络,是一个高效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从构建国家价值链迈向引领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全球化与国家战略互动的具体体现。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关键引擎和发动机。根据湾区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从萌芽到成

熟,大约需要 50 年的时间。从 1978 年改革开放算起,粤港澳大湾区从萌芽到成长已经经过 40 年。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将媲美甚至超越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龙头地区和产业发动机,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产业服务、资本服务、人才服务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服务体系和全球分布式的产业链合作机会,是全球化与国家战略互动的引领性平台,是未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全球治理的空间载体和经济增长极群落。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载体: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文丰安: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合作目标之一。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任务,也是最为核心的产业载体。

刘金山:我同意您的观点。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新工业革命智能化时代中脱颖而出,就要实现产业创新立湾。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需要突破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追寻可持续的收益递增的源泉,否则只能辉煌一时。收益递增源泉蕴藏于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各产业链环节的良性互动,会实现增加值的持续递增。

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任务。

制造业创新发展是大趋势,必须高度重视其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近 400 年来,在全世界发生的所有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都是制造业的危机。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这一进程将持续下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产业的角度看,就是要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能继续在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而应在更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就高附加值生产活动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即向高生产力的生产活动转变,向基于创新能力的生产活动转变。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文丰安: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梯度差异的竞争优势,在向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同时,制造业必须继续持续健康发展,并凭借健全的产业链,实现研发、设计、制造在大湾区内完成。

刘金山: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广东,是世界制造中心的关键组成部分。坚持制造业为发展之基,通过其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引领我国工业化进程,引领构建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引领构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微观基础,是大湾区肩负的历史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目标是成为领先者而非追随者。

以智能制造全球生产权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粤港澳大湾区要率先而为。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目标是成为领先者而非追随者。当前需要洞察制造业的发展基础,把握新工业革命时代制造业发展趋势,准确定位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并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从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基于空间多极网络视角,面对区域经济联系网络化趋势,规划和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形成多极支撑、轴带衔接、网络关联、极区互动、各具活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具体实践路径之一就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产业链拓展,通过区域性“增长极群落”之间的协调整合而获得大规模的效益溢出,实现多极互动的全面发展。

文丰安:以智能制造全球生产权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粤港澳大湾区要率先而为。

刘金山:未来我国要形成消费品出口和设备(资本品)出口并重的格局。这是培育国家价值链进而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关键组成部分,要主动从生产消费品为主转向生产消费品与生产资本品并重为主,率先形成国家价值链,进而谋求智能化消费品和智能化资本品的全球生产权。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国家价值链与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不能局限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应全面深入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智能化资本品既是产品出口的主要载体,又是资本输出的主要载体。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消费品制造业产业集群已现雏形,世界级资本品制造业产业集群正在起步。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产品集群带和珠江西岸高端装备制造制造业集群带,要朝着世界级产业集群目标发展。依托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要引领形成增长极群落。这一增长极群落应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动机,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网络群推动或者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产网络的形成与生产能力的提升。这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品与资本品产业快速发展的市场基础。同时,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对接。比如,要推动香港纳米材料/纳米级结构器件、光通信及智能消费类电子产品技术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大湾区科技创新企业及智能制造企业的对接;发挥港澳科技创新综合信息服务中心功能,搜集世界顶尖技术信息,共建共享科技信息平台,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产业共享体系。

文丰安: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需要湾区内部各地区产业链有效连接。这需要发挥“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刘金山:确实如此。大湾区内部各地区产业链连接,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基础,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的产业带已经自发形成世界上最为齐

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需要湾区内部各地区产业链有效连接。

全的制造业门类体系。这些连接在一定程度上是产业链上各环节体现市场决定性的自发行动,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要认识到,产业链连则兴,分则慢。在全产业链面前,行政边界将逐步消失,市场会冲破一切行政壁垒,实现产业链有效连接。同时,要进行各地区产业链连接的顶层设计,增进市场功能,加快产业链连接进程。产业链连接的顶层设计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产业存量,要绘制各地区支柱产业代表性企业产业链分布图和各地区产业链连接路线图,设计具体方案;二是产业增量,要协调制定大湾区内部产业发展规划,各地区可以联合靶向招商,按产业链原则集群式引进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产业链连接有助于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创新,期间会出现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但形成相对成熟的协同模式后,可持续的递增收益就会显现。同时,这一模式创新可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照系。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路径:全球化“融智”与全球化“融资”

文丰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有全球视野,面向全球集聚智力资源和资本,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努力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

全球化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全球化“融智”和全球化“融资”,通过全球化“融智”实现全球化“融资”。

刘金山:全球化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全球化“融智”和全球化“融资”,通过全球化“融智”实现全球化“融资”,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更是如此。要全球追寻企业家。当前全球进入新重商主义时代,不同于旧重商主义的顺差情结,各发达经济体都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竞争。各发达国家供给侧政策的核心是竞争追寻企业家,这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大国的崛起,一定是公司的崛起;公司的崛起,一定是企业家精神的崛起;企业家精神的崛起,一定是全方位多层次创新的崛起。这种创新可能是,发现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发明一个新的生产工具,想到一个新的营销点子,突然灵光一现有了一个新的设计创意,抑或探索一种抽象的新理论,实践一种新的技术。在货币泛滥的时代,企业家才是全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全球化时代,更加需要企业家的创新想象力,更加需要企业家的全球化创新实践。粤港澳大湾区追寻企业家,需要创新思维:既要看产值,又要看估值。招商引资往往只看产值,但从动态视角看,估值至关重要。高估值企业,有很大的可能从独角兽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建立国际性智力精英的人力资源储备库,虽在粤港澳大湾区,但要追踪全球,做到及时了解国际上特定领域领军人物及其团队的基本信息,便于沟通与联系,不求所在,但求所用。

文丰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引领拓展企业家的国际化能力。坚持外部引进和内部提升,是拓展企业家国际化能力的重要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应引领拓展企业家的国际
化能力。

刘金山: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或海外留学经历的企业家,具备无障碍国际专业交流的能力,是引进的主要对象。应拓展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提升企业家全球组织生产要素的能力,全力追求国际技术前沿并进行产业化,探索离岸创新中心建设。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即离岸创新中心,可以利用获取境外创新资源和智力支持,侧重于立足市场需求的应用技术开发和转移;为了与国际专利标准接轨,应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专利,以便未来应对知识产权争议。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就是早进入市场,早受益。新时代的一个趋势是,早进入国际市场,早受益。基于此,粤港澳大湾区应率先顺应“产业竞争将由企业间竞争和产业链间竞争转向产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的产业转型趋势,基于全球化视野,培育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系统,推动创新密集型产业发展。

文丰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加快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应加快国家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建设。

刘金山:全球化、智能化时代,孤胆英雄式的创新者已经过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挑战,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诸多参与者构成的合作创新生态系统,才能生产出复杂的智能产品。制造业创新中心是《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五大工程之首。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要成为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发现,其区域分布具有产业集聚特征,研究领域侧重于与地方传统产业相匹配;组织架构范式从“三螺旋”模式向“多螺旋”模式转变,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急需学习的。未来要通过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引领推进企业全球组织生产要素能力的提升,追求国际技术前沿并进行产业化,逐步探索构建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全球区域分布式智能制造系统,形成相对丰富的产业共享体系和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从而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模式。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家级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进驻粤港澳大湾区。

文丰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培育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需要培育世界一流的科
技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

刘金山: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粤港澳大湾区要塑造一支可以和世界先进产业工人相媲美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支队伍,理论知识水平高,经受过系统的实验室专业训练,能够很快适应并操作精密化、自动化、智能化的

生产流水线和设备,既懂硬件又懂软件,尤其是能通过工业软件调整参数,完善并提升产品品质。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

文丰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背景是“一国两制”。

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示范区,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刘金山:是的。激发与释放“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增强“一国”向心力,提升三地融合力,需要有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坚实的实践逻辑。如果说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是“一国两制”1.0版,2003年起的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合作是“一国两制”2.0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一国两制”3.0版。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示范区,应该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点是探索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等条件下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文丰安:《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动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充分发挥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殊作用,通过产业链链接,实现经济利益的协调。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充分发挥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殊作用,通过产业链链接,实现经济利益的协调。

刘金山:香港具有众多的具有全球业务布局的生产型综合服务企业,其业务范围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咨询、设计等专业服务;市场研究、广告、品牌推广、通信、信息技术等信息中介服务;风险投资、财富管理、资产组合、金融工具创新、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服务;会展、进出口、运输等贸易服务。这些生产型综合服务企业是产业链链接的关键,具有全球市场整合力。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布局所需要的,有利于打造大湾区的跨境投资、生产和贸易网络,提升境内外、产供销、上下游、内外贸、产业内与产业间的经济贸易一体化体系。

第一,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进广东(及内地)资本输出。目前广东已处于实施资本输出战略的重要机遇期。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是内地资本和国际规则接轨、适应、融合的过程。目前内地企业“走出去”呈现诸多的不适应症,与东道主国(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衔接出现问题。这需要熟悉国际规则和标准的企业或组织提供专业化的资本输出服务,进行资本输出项目的路线设计和风险评估,以及企业形象设计和品牌推广。同时,香港要成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和广东进而通过广东与内地连为一体。

第二,香港可助推广东(及内地)制造业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广东是世界制造中心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囿于制造业低端环节。香

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广东制造业逐步转型,智能化、网络化、生态化的制造技术与制造系统是其主要方向。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充分发挥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

港在微笑曲线两端具有优势,可以推动广东制造业向产业链中的研发(研发、材料、采购、设计)、营销(品牌、渠道、物流、金融)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可以在广东(及内地)构建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第三,香港要随广东(及内地)制造业转型而转型。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广东制造业逐步转型,智能化、网络化、生态化的制造技术与制造系统是其主要方向。广东正由一个主要生产消费品的世界工厂,转变成一个向世界提供先进设备的大基地、容纳世界优质产品的大市场。这意味着广东制造业需要的生产性服务在发生变化,香港要应时而动,研究高端设备制造业需要什么样的生产性服务,研究新工业革命对香港生产性服务的影响和应对路径。

第四,香港企业家、创业者应随内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而“北上”。广东正在迎来创业新时代,广东可制定相关规则,为香港企业家、香港青年人拓展创业通道和就业通道。重视香港高校与广东产业需求的链接。香港多所大学的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可以与广东产业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进行多渠道链接。

文丰安:《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动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要“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充分发挥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

刘金山:澳门既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又是中国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也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与葡萄牙等葡语、拉丁语国家有着较为密切的社会文化服务贸易联系。广东可以依托澳门的“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会展合作中心”“中葡人民币清算中心”等中葡商贸合作平台,联手开拓拉美、非洲等地葡语系国家市场。同时,依托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实验室、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罗重谱)